

诗
想
者

H I P O E M

■ 王士强 著

Xiaofei Shidai

De

Shiyi Yu

Ziyou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

新 世 纪 诗 歌 勘 察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

新世纪诗歌勘察

王士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 / 王士强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95-9705-5

I. ①消… II. ①王…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
当代—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72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7 字数：17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2017年，中国新诗迎来百岁诞辰。无论是兴盛期的群星璀璨，还是边缘化中的“野草”疯长，诗歌都以其独特的价值而葆有奇异的生命力，诗学理论也伴随诗歌发展而发展。百年回首，诗歌发展现状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构建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南方诗歌传播中心“诗想者”品牌着力推出“学人文库”，拟为改良当下诗歌生态提供一种参照。

中国新诗萌生之后，从早期呈现“百花齐放”的样态，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压抑而蓄积能量，80年代得到爆发，90年代转向注重语言技艺的自我关注，到21世纪初期则呈现为活跃的多种诗歌活动和网络诗歌现象。诗歌的发展将何去何从？这就要整体性地对百年新诗进行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的梳理，由问题意识出发把握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同时注重哲学思想转型和美学流变对新诗的写作技艺、思想与风格变化的影响，并通过研究代表性诗人、诗作来透视个体写作的历史意识、精神观照和语言表达技艺发展路径，为中国诗歌更好地发展提供营养。诗学被要求保持对当下诗歌问题的敏感和思考，不仅要有能力为巩固诗歌地位而进行自我辩护，还要与社会、时代保持反思性关联，并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样的理论向度。

“诗想者·学人文库”推出国内6位“70后”诗歌批评家的诗学论文集或专著，包括陈卫的《中国诗人诗想录》、刘波的《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熊辉的《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易彬的《记忆之书》、张立群的《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和王士强的《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他们既注重从总体上对中国百年新诗发展问题和现象进行宏观观照，关注时代思潮演变和中西方文化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又着力于诗人的个案研究，并对单首的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品鉴。更有意思的是，本辑6位青年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研究还大致提供了一种诗学研究的对比，可以给诗人、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良好的参考。当然，本辑著作不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还请诗人、学者和广大普通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愿共同期待更丰赡的中国诗歌、诗学景观。

南方诗歌传播中心

2017年2月

目 录

现象解析

第一辑

“诗歌边缘化”问题一辨 / 3

新世纪十年诗歌热点问题回顾与反思 / 7

驻校诗人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 36

“余秀华热”背后的冷思考 / 49

危机背后的繁荣与繁荣背后的危机

——新世纪诗歌年选、诗歌奖、极端性写作之解析 / 58

诗艺考辨

第二辑

先锋诗歌：运动消泯，精神不息

——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问题 / 77

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

——新世纪诗歌的几个侧面 / 87

“说真话”与当下诗歌 / 101

伪繁荣，伪创造，伪自由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 / 106

“打工诗歌”：话题与本体

——兼谈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 116

新世纪诗歌：活力大于危机 / 128

有重量的写作

——论朵渔 / 143

在“权利”与“权力”面前

——论郑小琼 / 155

“真实”的诗意与诗意的“真实”

——论谷禾 / 163

“轻松”与“并不轻松”

——李轻松诗歌的情感张力 / 173

“暗夜里坚守内心火焰”

——关于聂权的诗 / 182

诗歌，倾听微细的声响

——由黄礼孩《杧果街魔法》所想到的 / 189

背对时代与抵达内心

——读李小洛诗歌《省下我》 / 193

忧伤的对话，或冷峻的独白

——读唐果诗歌《我们去》 / 198

语言的绵延、狂欢与反抗

——读轩辕轼轲的诗 / 203

把命嵌进文字里

——刘年诗歌读札 / 211

后 记 / 216

——第一辑——

现象解析

“诗歌边缘化”问题一辨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诗歌边缘化”“诗歌在消亡”的说法俨然成为一种“常识”，谈论起这个话题，许多人痛心疾首、忧心忡忡，许多人义愤填膺、悲愤激昂。不过，在老调重弹和道德评判之外，问题并没有被引向深入：当今时代的诗歌果真在边缘化、在消亡吗？如果有，它是如何边缘化、如何消亡的？边缘化必定导致消亡吗？如果没有，该如何评价当今的诗歌状况？

与边缘相对的是中心，那么，中国诗歌有过“中心化”吗？单就最近的历史而言，确曾有过。“新时期”之初，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时的诗歌发出的是时代最强音，处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地带，诗人享有的是如今日娱乐明星般的偶像级别的待遇。这种“中心”地位确实极大提高了诗歌的知名度，但实际上值得反思的是：它是正常的吗？它对于“诗歌”更有意义还是对于“社会”更有意义？应该看到，彼时的诗歌之所以有如此的“荣光”，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与政治的合一，诗歌是与社会政治、与流行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学诉求与政治诉求的合一；更大程度上，是政治诉求通过文学诉求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才是彼时诗歌“中心化”的深层本质。这里面的问题是：诗歌以这样的方式发言，因而也难逃简单、粗糙、平面化、模式化等

弊病。所以，这里的诗歌仍然不具有独立性，它自身的主体性并没有建立起来。随着诗歌“自律”的增强，它注定不会再成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言，当诗歌处于中心的时候，往往是它被征用、成为工具的时候，它并不具有独立性。不唯80年代中心化的诗歌可作如是观，此前的小靳庄诗歌、大跃进民歌、墙头诗、传单诗等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可能发挥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用（或正面的，或负面的），但社会进程与艺术规律往往并不是同步的，强调社会效用往往意味着艺术创新与艺术独立的不足，这样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只能成为应时、应景之作。实际上，边缘，正是诗歌所应处的位置，它与中心天然无缘（如布罗茨基所说，诗人是天生的民主派），它不是聚光灯下的公众景观。它不应成为其他任何事物的附属或说明，而应具有自明的价值意义；它应该与社会现实保持有距离的审视，因为它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更为长久、更为广阔的存在。

诗歌应处“边缘”，并不意味着诗歌不重要。恰相反，它很重要，重要到犹如我们自己的呼吸、心跳，我们周围的空气、阳光和水，它形成了我们的文化“身体”和文化“环境”。中国是一个有着“诗教”传统的国家，这里的“教”不仅是一种“教育”，一定意义上也带有“宗教”的性质，“不学诗，无以言”，想一想，连话都不会说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屈原、李白、杜甫等的诗歌确实已经将其话语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融入到了国人的血液之中，是诗歌构筑了国人的精神边界（世界）。这便是文化的力量、诗歌的力量。确实，“没有一首诗歌可以阻止一辆坦克”（希尼语），但是，同时，也没有一辆坦克可以真正消灭

一首诗歌，诗歌的力量是无形、无穷、强大的，它是一种无能之能、无用之用，却也正是大能、大用。不过，它作用的方式不是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也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我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心跳一样。当人们感觉到它、不得不注意它的时候，往往是出现异常、存在某种危险的时候。因此，当它来到中心、为万众所瞩目的时候，它正处于某种危险之中。

历史的发展是吊诡的，斗转星移，不久前还是“偶像”的诗人，而今却成了“呕象”（呕吐的对象），诗歌也从万众瞩目变得无人喝彩，当今的诗歌确实“不景气”，关注的人不多，发挥的社会效用似乎也不大。那么，对于当下诗歌的“边缘化”，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大可不必过于悲观，相反，倒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只要诗人保持有尊严的精神生活，创作出有成色的艺术作品，那便是尽到了本分，至于大众反应和现实影响，其实并不必成为关注的重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时间。而且，在诗人尽到了本分（非肆意妄为、哗众取宠、自毁形象）的情况下，诗歌界的良好生态也有望形成，读者和社会反响也会越来越好。同时还应该看到，当今的诗歌可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机遇，就外部环境来说，言论空间较之以往更大、更自由，随着社会经济活力的增强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更多的诗人也可以更加有能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显然都是此前的社会阶段所不具备的；就传播媒介来说，近年来，除传统诗歌刊物的发表阵地外，民间诗歌刊物的发展愈发兴盛，而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它们提供了空前的自由度和可能性，这应该可以成为解放艺术生产力、提升艺术格局、推进艺术创造的良好

好契机。从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诗歌作品和诗歌写作者的数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有大幅度增加的，诗歌发展似乎还有某种“上升”势头，而非“消亡”。在而今的情况下，诗歌的“边缘化”虽有之，“消亡”则未免属于杞人忧天。大量的诗人正是在边缘、在民间进行着他们的创作，虽然寂寞与孤独有之，压力与困惑有之，但他们坚持着、探索着、创造着，他们（当然是指真正的诗人）是无愧于内心、无愧于时代的。

也许，诗歌原本就是少数人的事，它很大程度上属于“一根筋”，执拗、顽强、不屈不挠，它在时代的边缘行走，却行之久远，能够贯穿古今，能够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话，产生共鸣，点燃思想的火焰。诗歌几乎是与人的创造力、审美力相等同，与人的生存历史相同步的，它并不会如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轻易消亡。而诗人，则大多天赋异禀，承担着与众不同的、神启般的工作，他是一个时代隐秘的王者，或者可笑的堂吉诃德，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存在，就像无论是一个多么愚钝的时代，总会有一些聪明的人，或者，无论是一个多么聪明的时代，总会有一些愚钝的人一样。

新世纪十年诗歌热点问题回顾与反思

进入 21 世纪以来，诗歌并没有如此前有人所预言的那样“消亡”，相反，与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发展相关联，新的诗人大量涌现，诗歌作品数量激增，一些人甚至由此做出“诗歌中兴”的论断。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虽然并不应报以简单的乐观态度，但说它的质量毫不足道、无甚可观，似乎于理于情都难以让人信服。而今，新世纪已经悄然走过了它的第一个十年，当我们回过头去反观的时候，我们看到诗歌的确在“边缘化”，但是，它是在场的，虽然它不再处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但却从未缺席。近十年的诗歌大致是波澜不惊的，它在默默地承担着它所能承担和所应承担的东西。但是，也并非没有“热点”，并非没有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话题的个例，本文拟选取新世纪以来诗歌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这无论对于诗歌的现在或未来、内部或外部都是有必要的，有很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记取。

本文准备谈论新世纪十年诗歌中的五个热点问题，它们是：“下半身”诗歌与“身体写作”；“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梨花体”与“口水诗歌”；诗歌标准问题讨论；“地震诗潮”。文章将不以综述性写法为主，而主要是对事件与现象加以反思、回顾，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个人化的论析、评述。

一、“下半身”诗歌与“身体写作”

诗歌民刊《下半身》在 2000 年夏天的出现可谓惊世骇俗，它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扔进了平静的池塘，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争议（其中大多是否定性的）。而这一事件本身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文本”来看待，其后果除了使参加者以整体性的姿态站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广为人知之外，似乎也昭示了诗歌发展中由来已久的身体观念的变化，更成为新世纪诗歌“身体”变革的一个预兆和开端。因而，“下半身”诗歌除了它自身的得失成败之外，也可以作为新世纪诗歌“身体写作”的一种隐喻。

“下半身”诗歌的艺术主张最典型地体现在沈浩波为该刊写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就是你写的诗与你的肉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紧贴着的还是隔膜的呢？贴近肉体，呈现的将是一种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作‘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

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①这篇张扬凌厉的“宣言”凸显了一种特异的自我形象，颇具“革命”意味。另一位诗人朵渔则如此解释“下半身”：“下半身写作，首先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上述简单的引述可以看出，“下半身”写作首先是作为一种对于“文化化”了的“上半身”的反抗存在的，他们提倡一种有活力、原生性、动物性的“肉身写作”“肉体写作”，肉体、欲望被当成了诗歌的本质性、拯救性力量。在总共两期的《下半身》诗歌刊物中，确如朵渔所说，“‘下半身’的‘成功’之处是对‘身体’的强调，其最大的‘卖点’是‘性’”，它最为引人关注的的确是“性”，“下半身”诗歌中充斥着性话语，对于“性”的津津乐道一方面可能是一种无遮掩的、本真的抒发与认同，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反抗和吸引眼球的手段，后者类似于一种“恶性发作”，也是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所在。《下半身》“集束性”地推出了一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沈浩波、朵渔、南人、李红旗、尹丽川、巫昂、盛兴、朱剑等，他们的写作对于“性”“下半身”或多或少均有涉及，但其各自的写法并不相同，而且其中有的确实体现了活力、祛魅、真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有的作品为性而性，类似黄段子，有的写得丑陋、肮脏、毫无意味，有的甚至有突破道德与人伦底线之嫌，这些都很难称得上是艺术作品。

实际上稍作分析即可看出他们的理论主张和书写策略之中的

①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下半身》2000年7月第1期。

悖论所在：肉体、身体本身并不能真正、完全地脱离所谓“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恰相反，肉体本身便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产物，诗歌本身便是文化的产物，如何可能彻底地反文化，站到文化的反面？甚至，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成果，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反文化反到最后，岂不是自身也在打倒之列？在此前的文化境遇中，“性”受到了遮蔽和误置，但现在，将它无限放大是否就是合适的，是否应该有必要的自律和规则？如此等等。应该说，其中的问题和谬误是显见的。有论者从三个方面对“下半身”写作的文学和文化姿态进行分析，认为它“足以昭示当代中国文学界与文化界对待与书写身体方面的几个典型症候”：“下半身”崇拜、“下半身”一元论、“下半身”专制主义，“下半身”本质主义，作为诗歌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与工具^①，这的确指出了“下半身”写作存在的问题。

不过，单纯在这里谈论“下半身”的不足似乎并无意义，我们更应该追究的是：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对于诗歌和当代文学、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此我们便有了更重要的发现。“下半身”诗歌其实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写作趋向的分化有关，它的产生源于其中“民间写作”的发展，自于坚、韩东，到伊沙，再到沈浩波、朵渔等，这是一条相连贯的脉络，“下半身”诗歌“反文化”、反对“上半身”的目标，正是反对坚持强调专业性、技艺、知识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更为注重诗歌的及物性、活力、口

^① 陶东风：《“下半身”崇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